

与君同在

——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

○林 洙（教）

在梁思成的书房中，有一副任公先生手书的李、杜诗句的集联：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

这是任公先生对儿子的期盼，也是遗训。他望儿子在做方面要清清白白，如出水芙蓉般的纯洁坦荡；对事业如白鸥冲破万里波涛般的勇猛直前，不顾及个人得失。我曾久久地沉思在这两句遗训中。

思成走了近40年了，但他几乎每天都与我同在，我仍能听到他的关心与笑语，我不断地在解读他。

从我认识他到1966年，对我来说他在学术上是那么高不可攀。有人问我：“你对他的‘建筑’，懂得多少？”是啊，对他的建筑我什么都不懂。但他懂得生活，他懂得关心人，他懂得尊重人，这就够了。我不认为所有的妻子都要懂得丈夫的专业。

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和学社的同仁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寻找我国仅存的一些古建筑，对它们进行调查测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是老一辈古建工作者艰苦创业的时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个令人听了都会战栗的时代，不管什么人，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不管人们怎样躲避，你都被迫推上台来亮一亮相，我也从恐怖到悲痛到冷静。



梁思成先生

我看清了人们，也认清了自己，但是更令我感到幸福的是我看到了思成的灵魂，看到了我所从未认识到的他那和蔼可亲的另一面——严肃与理性。不管当时群众用什么语言来谩骂，来批斗，他都没有动怒。他用来衡量自己的是对祖国的忠诚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我被他身上那股顽强、内在的精神力量，那种诚恳、那种灵魂的坦白所感动。爱情并非只向对方索取，爱情还包含着给予，给予也是一种幸福。在那充满专政、暴力、恐怖的气氛下，我突然感到心灵深处的平静。尽管我仍然是那个“反动权威”的老婆，尽管我们已经坠入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一段生活的经历却是我的一笔财富，是无价的财富，它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

这个时候来向他做外调的人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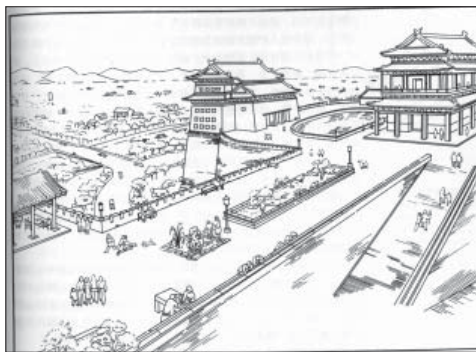
多，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得到他们所调查对象的毁灭性的材料。有时他们甚至挑拨性地启发他怎样写材料。思成的态度不管过去与对方有什么恩怨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我想我也许是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他人品中的善良与正直。他做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0年代初“梁陈方案”被否定了，“民族形式”被批判了，为保护北京的古建，保护北京的总体环境，他和北京市领导人吵得不可开交。我在他身上看到“万里谁能驯”的精神。后来渐渐看不到了，似乎真的成了“党的驯服工具”。为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后来我从他的笔记中找到了。

自1949—1966年他记了近70本笔记，“文革”期间曾被抄走，又发还但已不全。这些笔记只是一次次会议的记录，某年某月开了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哪些人与会，每个人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看法。

除此之外，在1949—1966这17年间，他以政协常委的身份、人大常委的身份、科学家的身份……出席了无数次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会，上至总理、国家各部委的首脑、各界的政要，下至清华的校长、书记。有关这类会议的记录约占他笔记的60%~70%。报告内容绝大多数都是讲述从1949年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条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与成就。在这日积月累长期的教育下，他深切感受到祖国正蒸蒸日上，越来越富强。祖国的富强与壮大，正是他前半生所梦寐以求的。这一个接一个的报告，促使他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



梁思成的北京城墙规划方案

正确的，促使他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就等于祖国，但是从他从事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又感到不是完全和党协调。

在1949年初，他为保护北京这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虽然当时以“对苏联专家分庭抗理”为由，不允许再争辩。但是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和领导之间存在分歧。到了60年代初他终于对他的学生说出了心里话：“我至今仍认为‘梁陈方案’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小问题上还可以改进。但是我不愿意你们再去坚持我的主张，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

1952年在全面学苏号召下，把他制定的教学计划推翻了。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尽管如此，他对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失去信心。但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虽然自己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仍处于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的地位。他认为这是因为他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造成的。他决心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

□ 怀念师友

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一名学者，学术思想的全盘否定，就等于宣判死刑。他苦苦地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挣扎着。最后他发出了“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哀叹。他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失去了改造思想的希望，失去了欢乐。

1972年思成去世后，我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他一生的功过，他的那些古建筑调查报告是我们继续研究古建筑所必不可少的依据。1966年中华书局曾有再版他过去的学术著作的计划，但因“文革”而未实现，直到他去世“文革”尚未结束。我也就只能等待。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邓小平副总理复出，我才给邓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梁思成的条目。因为《辞海》中梁思成的条目是“四人帮”把持下的清华党委定的，还是一个反动权威的形象。我要求对他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二、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邓副总理很快将我的信批给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成立了。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编委会成员也是小心翼翼地斟酌文集的内容。但终究还是选入了梁思成的主要古建筑调查报告，及《清式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注释》和英文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三本专著。这项工作从70年代末开始，1982年《梁思成文集》第一集出版，一直到1986年第四集出版，历经四年才出齐了《梁思成文集》四集，及《清式营造则例》等三本专著。除了邀请一些专家负责校稿外，我的工作主要是选配文集中所有的图片。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不愿干、没能力的人干不了的累活。面



梁思成与林洙1962年摄于清华大学12公寓

临上千张的插图，我只能安下心来一点一点地校对查找，这时思成常常说的“笨人下笨功夫”的话，又回响在耳边。

对古建筑来说我做了多年的资料工作，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尚能完成任务。最困难的是为《中国雕塑史》配图，雕塑史是1930年他在东北大学时讲课的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那时候他本人还没有去过云冈及龙门，所以文中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外国学者的著述。天哪！我到哪里去找这些图片呢？我想起他的好友费正清夫妇，于是写信给费慰梅，告诉她我碰到的困难，慰梅很快就寄来了我需要的美国博物馆馆藏的图片。但是更多的图只注明见(OXX图)，这个“O”又是一本什么书呢？最主要的是我对雕塑完全不懂，我终日反复读着他的文稿，一筹莫展。一天在字里行间看到Oswald一字，

我断定……“O”书必定是Oswald的简写，我兴冲冲地跑到中央美院的图书馆，但没有查到我要的书。我想北京图书馆可谓国内最大的图书馆了，但查了两天仍是一无所获。最后我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咨询部求救。我很难为情地向一位老先生说明我的来意，告诉他我要找的书是外国著者写的，但我不知道书名，只知道作者姓名打头的字母是“O”，书很厚，因为它的插图多到了几百号，内容是有关雕塑的。感谢上帝！这位老先生居然很快就查到Oswald Siren的名字并告诉我说著者的中译名叫奥斯瓦尔德·喜龙仁，该书叫《中国雕塑》，分上、中、下三大册。他很快就从善本书库中将书调出。我对照书稿写的内容一看，果然不错。真是喜从天降。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感谢这位老先生，但还没认识到这正是图书工作者的高尚之处，正是他们几十年勤勤恳恳的工作积累下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才能轻而易举地帮助读者解决难题。梁思庄（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女儿吴荔明曾这样评论她的母亲说：“她一生留下的文章不多，但许多专家教授们的著作和学生们的论文中，都包含了她的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

我还要特别感谢四位不知姓名的朋友。《梁思成文集》中多处提到云冈及龙门的塑像，但我那时还没有去过云冈、龙门，对文中的描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只好给当时的云冈及龙门石窟管理处各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们。很快我收到了他们拍摄的清晰而精美的图片。其他还有南京栖霞寺塔基础上的八相图，及角直保圣寺唐代的罗汉像（后经鉴定为宋塑），也都是素不相识的朋友

帮我拍摄的。现在回想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尽管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没有一个朋友肯收我一分钱。

《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出版更是感人，费慰梅为此书在美国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两次从波士顿飞到北京与我商讨出版事宜。在出版过程中，我与慰梅书信不断，而且我只能用中文给她写信，她只能用英文给我回信，我们各在大洋彼岸，抱着英汉和汉英字典交换意见。该书出版后我又陪慰梅沿着思成当年的调查路线到正定、大同、应县、五台山及河南等地参观当年思成考察过的古建筑。当时旅游业还没有开展，所以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外办的招待。1987年我又应她邀请去波士顿做客，访问了思成的母校哈佛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还去了耶鲁大学，思成1946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儿讲授过“中国艺术史”。我希望能在耶鲁找到他当年讲授“中国雕塑史”时的讲稿，但是除了当年用的幻灯片外，找不到一点文字的记录。耶鲁大学的巫敬旅教授还热心地特意找到当年思成在此讲学时住的客房，请我去住了一夜。

为了纪念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与建工出版社决定出版《梁思成全集》，于是我从1997年开始重新整理思成的文稿，这是思成去世后我第二次通读他的作品。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梁思成全集》九卷顺利出版。但这九卷中缺少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另一篇是《半个人的世界》。《半个人的世界》是他（1946—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后回来做的一个有关教育的讲话。虽是一篇短文，但却

□ 怀念师友

简单扼要地反映了他理工与人文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应县木塔》是他1933年与莫宗江同去应县测绘的，1935年又去补测了一次，因结构复杂，直到1936年才完成，但送印刷厂后因抗日战争而未能出版，稿子也丢失了。应县木塔是世界上木结构建筑中最高的一座构筑物，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这也是《梁思成全集》九卷中一个极大的遗憾。

2006年中国文物研究中心为了鉴定梁思成一份文稿的真伪，请我去辨认。我前去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竟是《应县木塔》的誊写稿，虽不是梁的亲笔，但我断定这就是当年送印刷厂的那份稿子，由于战争，印刷厂在关闭时已把稿子退回营造学社（当时梁已去后方）。但是随文稿送去的60多张插图及100多张照片却不知去向，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文物中心在资料室找到了30多张插图，几经周折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过问下，终于得到了图稿的复印件，但只有30张。缺失的部分，只能用梁莫二人当年的原始测稿来补充，但由于测稿在抗战期间被污水泡过，字迹难以辨认。我带着这些图往返于清华与中国图片社之间。在图片社诸多专家的努力下，凭借专家们丰富的经验，通过不断耐心的试验，终于使图纸得以辨认，我永远感谢中国图片社的专家们，他们为保护我国的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此后在建工出版社刘爱灵女士的努力下，又补充了部分内容连同《应县木塔》一并收入，《梁思成全集》第十卷在2007年出版。

与此同，时我又整理出版了梁思成未完成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工程做法则例全书共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

为二十七种不同建筑物的做法及尺寸的记述。卷二十八至四十为斗拱的做法。四十卷以下为门窗、石做、土做及工料之估算，等等。梁思成将四十卷以前的做法则例用现代科学的绘图法绘制出草图来，在绘正式墨线图时，他还在不断地研究清式做法，并把墨线图中发现的问题用铅笔标在图上准备修改。由于战争爆发没有最后完成，在出全集时，因为该书没有最后完稿所以未收入。但我考虑到这是耗费了梁思成多年精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虽没有最后成书，但对研究清式做法仍极有参考价值，应整理出版。1945年营造学社解散时，也有部分图纸没有完成。这部分图多数是四川地区的建筑，对研究四川的传统建筑是宝贵的材料，因此我也把这些材料逐步整理出来。在全集十卷出版后又出版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图解》，《未完成的测绘图》等。

在完成了以上工作之后，日夜困扰我的就是怎样实现他写《中国雕塑史》的夙愿了。他对雕塑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将“这些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的学生”。我不停地翻阅他的著述中有关雕塑的描绘，从云冈早期面貌无精神的巨大佛像，到后期表现出慈祥、微笑的胁侍。龙门那身材苗条的小佛及至龙门的大卢舍那像，先生描写他绝对沉静、微笑的胁侍，面部表现出一种内神均平无倚之境界，是宗教信仰的结晶品。大同薄伽教藏殿中那合掌露齿微笑的胁侍是极难见到的。直到四川大足的大量雕塑。我越看越体会到这些内容太丰富了，可惜他没能把他思想里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不过我想如果能把他所

有的文章中有关雕塑的论述整理出来，也许对读者会有些许帮助。2009年我终于把有关雕塑的图文整理完毕，这是我为思成做的最后一本书了。我感到十分轻松，但也十分惆怅，仿佛我又在和他告别。

2009年中国科学院准备为我国20世纪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出一套小传，每位传主只限一万两千字。这个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为科学家写传我可连想都没想过，何况要浓缩在一万两千字内。我不能泛泛地谈他是个建筑学家，这谁都知道。也不能泛泛地说说他办了两个建筑系……。我必须回答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建筑史学家的，他是什么时候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他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建筑教育思想有什么特色？他为什么能成为古建保护的先驱？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又第三次通读了他的著作，我又走进他的世界与他同在。仅仅读他本人的作品还不够，我还要学习其他学者对他的评论，这里陈志华、赖德麟的论述帮我深入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不断地与王军就各种问题相互切磋。

这时，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学者的形像，才实实在在而真切地矗立在我面前。

当他第一次调查独乐寺时，他已开始注意到一些构造做法与明清建筑的不同。在调查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及摩尼殿的构造时，引起他极大的注意。据日本学者的考证，认为转轮藏殿是明清建筑，但是梁思成经过对转轮藏的仔细研究，将它斗拱的构造与宋《法式》中斗拱的构造做了反复的比较，认为转轮藏殿应建于元以前。后经过考证，果然是辽代建筑。摩尼殿虽然没有文献记载，但他从摩尼殿四面出抱

厦的做法肯定它是宋代建筑。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的建筑年代，这与他经常研究各时代的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艺术作品中包含着各时代的信息。所以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

过去我读他的调查报告，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每座古建筑的平立剖面图，及细部斗拱等。这次我再读大同古建调查报告，看到了他治学的内在精神，严谨及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他把独乐寺、广济寺、隆兴寺及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这批宋辽时期的建筑，从整体到细部反复地做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当时佛光寺大殿尚未发现，他只能借鉴敦煌壁画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等古建来了解唐代古建的做法。往下至明清的官式建筑中还能看到宋辽时期的手法。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经过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他又从散落在个别石窟中的建筑构件——屋顶、斗拱、阑额、柱、栏杆、踏步、藻井等零星构件中得出了：中国建筑在两千年前，已形成了结构上的独立性，并一直保持下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特点。为什么梁思成能这么快地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对西方建筑史下过功夫，所以能对东西方的建筑体系格外敏感。我认为在1933年通过古建、石窟的调查，他已基本理清了我国建筑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脉络，但他没有急于成书，还要通过更多的古建调查来验证他的推断。

1937年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抗日战争后又对西南地区的古建做了较全面的

□ 怀念师友

调查，四川的汉阙及大量的唐宋摩崖雕刻更填补了唐代建筑实物之不足，也证实了他对中国建筑发展的观点。

1942年，他开始动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及《营造法式注释》。我终于明白了，他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撰稿人，正是因为他研究方法的正确，刻苦的钻研，对东西方建筑的谙熟，及对广泛外围知识的掌握，再加上个人的智慧。

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来后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没有照搬美国的教学大纲，而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

对建筑科学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及建筑学科发展方向的把握，对传统建筑教育的课程作了全面的取舍、增设。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成功之处，也使他的建筑思想明显超越大多数同辈建筑家。同样基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北京市的规划、对古建筑保护乃至对全人类的宝贵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没有想到，对他的认识，对我最亲近的人的认识竟长达几十年。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2010年6月于清华园

1936级老学长陈冠荣院士逝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化学工业部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副主任陈冠荣，因病于2010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陈冠荣学长1915年12月5日生于湖北武汉，籍贯上海。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常委。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冠荣学长是新中国化工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领导设计了数十套化工生产装置，其中有不少是国内首次建设、带有试验性质的；他参与了有关发展我国化学工业的各项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国产化三步曲”的设想，组织制订和推行化工



新技术开发管理工作制度，对科研成果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化工技术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先后担任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化工学报》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卷》副主编，《化工百科全书》主编，为整理、总结、普及化学理论与化学工业知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